

社会福利态度研究的动态与趋势

沈冰清 林闽钢

【摘要】社会福利态度是社会的“晴雨表”，是社会政策研究的前沿领域。通过聚焦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态度研究的发展，梳理出社会福利态度研究的主要议题为：社会福利态度的多样性、群体差异性、社会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的对应性，并归纳出社会福利态度研究在视角、方法上所出现的两个变化：即制度视角转向风险视角，变得更加多元、丰富；方法上定性方法开始兴起，力图解释社会福利态度更深层次的原因。今后，进一步解释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机制和反馈路径、把握社会福利态度与政策之间的动态变化，将成为社会福利态度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社会福利态度；制度视角；风险视角

【作者简介】沈冰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林闽钢（通讯作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联系方式 mglin@nju.edu.cn（南京210023）。

【原文出处】《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南昌），2020.6.57~65

一、研究背景

社会福利态度(welfare attitudes)是社会的“晴雨表”，是民众对以政府为主的多元福利供给主体的行为及政策所形成的看法、观点和信念。社会福利态度最早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所开展的选举调查。到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滞涨引起人们对福利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质疑，民众对福利国家的支持度下降是最直接的表现，由此引发经济学家最先从个体自利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提出“再分配偏好”(preference for redistribution)来解释其中的原因，即民众对收入再分配的支持程度(Meltzer和Richard, 1981)。^[1]

社会福利态度作为一种社会态度，涉及民众对福利的信念和观点。一方面与再分配效应、社会不平等联系紧密；另一方面通过反馈机制传递给决策者，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社会福利态度所具有的多样性、综合性得到多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关注，如心理学开展的研究将福利应得性(welfare deservingness)划分为控制、态度、互惠、身份、需要五个方面，并形成量表来分析受益者应不应该

得到福利(Petersen等, 2012)；经济学角度的研究侧重再分配，瞄准经济危机下不同群体间偏好的异质性(Sachweh, 2017)；社会学开展的研究关注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不平等引起的态度变化(Boberg-Fazlić和Sharp, 2017)；政治学角度的研究基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探索机会均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下的民众态度，推进民主进程(Mau和Wrobel, 2006)；传播学开展的研究试图寻找舆论与政策间的反馈机制，态度借助媒体或其他途径付诸实践(Merkley和Owen, 2019)。^[2-6]近年来，在社会政策领域中，针对养老金改革、医疗服务利用、贫困与救助、工作福利、育儿政策等方面研究成为热门议题。大型调查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加速了多学科研究与社会福利态度领域的交叉融合，社会福利态度研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使其成为国际社会政策的前沿领域。

本文聚焦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进展，梳理出社会福利态度的主要议题，对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变化进行分析，并试图对未来的社会福利态度研究趋势进行研判。

二、社会福利态度研究的主要议题

(一)社会福利态度的多样性

早期社会福利态度的定义和测度较为单一,聚焦民众对福利的总体看法。随着社会福利态度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注意到不同制度下社会福利态度所呈现出的多样性。

第一,社会福利态度的多样性表现在福利国家实施的各个环节上,集中在责任主体、目标、范围、程度、再分配设计、实施过程的执行效率和效力、结果七个方面,相对应的观点与看法也围绕政府责任的边界延伸或拓展(Roosma等,2013)。^[7]对比不同环节下的福利态度,可以发现其多维、复杂的特点,并以此作为实证研究中测度福利态度的分析框架。首先是民众在福利责任主体的选择上,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等供给主体。其次是民众对福利国家政策某些既定目标的认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包含范围和程度两个方面的判断,二者通常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被视作社会福利态度的核心内容。政府是否应该承担就业、医疗、养老和教育等方面的责任,在相应类型政策上应当花费多少社会支出,是最能突出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表现。再分配设计更多的是从福利需求方,即对象选择的角度探讨何种条件下人们有权利享有福利。当出现财政紧缩的情况时,通过比较不同受益群体在民众心中的应得性来确定福利优先级,如老年人的福利应得性最高,失业者应得性较低,移民则是最不应该得到福利的群体(Petersen等,2010)。^[8]实施过程中,民众对政府执行效率和有效性的评判,遵循罗斯坦的程序正义原则(procedural justice),即以公平的方式执行,也是对政府管理和服务的一种监督(博·罗思坦,2017)。^[9]最后是民众对政府提供福利结果的态度,这与政策评估有重叠,但二者侧重不同。政策评估强调政策是否达到既定目标的预期结果,如救助制度是否减少了贫困发生率。社会福利态度还包含非预期结果,涉及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和道德风险,倘若政府实施的救助制度在减少贫困发生率的同时,未产生税收负担和懒惰依赖现象,民众对其的支持率和信任度会更高(Van Oorschot,2010)。^[10]

第二,社会福利态度的多样性还表现在民众对

代际福利、移民福利态度的分化和整合上。一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养老、医疗等公共支出的上行压力使得老年人受到较大的年龄偏见(Esping-Andersen和Sarasa,2002),与年轻人在福利分配上的代际冲突是否存在,将取决于各自对其他年龄段政策的支持程度。^[11]最近的社会福利态度研究发现,代际团结已经在福利国家中萌芽:青年人关心老年人的需要,认同老年人的福利应得性,即便要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也倾向于提高养老金收入以应对老年贫困问题;而老年人对年轻一代的关心体现在孙辈的公共托儿服务和教育上(Lober,2017)。^[12]总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通过福利制度化解人们面临与年龄相关的各种社会风险,建立代际间的平等关系,促进和维护平衡的代际福利契约,可以形成不同群体间更稳固的代际团结(Birnbaum等,2017)。^[13]二是在多数福利国家,移民被贴上了最不应得福利人群的标签,福利沙文主义(welfare chauvinism)将其归咎于移民给公共服务带来的负担远远超过了其工作和税收贡献,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负担(Garand等,2015)。^[14]当从移民的角度看待福利国家时,这部分“局外人”的福利态度与其他民众的融合度较高,尤其在第二代移民中表现更为突出,这可能源于他们更脆弱的社会经济地位及渴望被认同的归属感(Reeskens和Van Oorschot,2015;Lubbers等,2018)。^[15-16]进一步研究表明,移民与本地民众之间在社会权利的享有上存在差距,但不同体制、不同类型的移民都在通过文化适应融入本地民众中,并愿意遵循本地民众的偏好,减少与其的异质性(Kurowska等,2019;Hedegaard和Bekhuis,2019)。^[17-18]由此可见,虽然存在福利沙文主义所带来的福利态度的分化可能,但移民的福利态度总体上是不断被同化的过程。

(二)社会福利态度的群体差异性

最初探讨民众的福利态度,人们会依据福利政策的受众群体寻找共性和差别,其中个体自利、意识形态等微观因素的影响最为突出。在自利假设下,受益群体相比其他人群更支持公共政策,如老年人、儿童、失业者、病患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会更倾向于强化政府责任来满足他们的福利需求。这就意味着年龄、性别、就业状态、健康状况、社会阶层等因素

会影响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以年龄为例,老年人会更关注医疗、护理及养老方面的福利政策,青年人更会选择就业、教育及儿童相关的福利项目(Rueda和Stegmueller, 2019)。^[19]同样,女性相比男性、失业者相比就业者、患病的人相比身体健康的人会持有更积极的社会福利态度。社会阶层这一因素较为特殊,其对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存在相反的观点:一些国家或地区民众对福利国家的认同度随所处社会阶层提高而下降(Kumlin和Svallfors, 2008),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社会阶层越高的人越认同福利国家(Kim和Yeo, 2011)。^[20-21]此外,群体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是预测社会福利态度的重要因素:经济个人主义、社会公平意识、政党派别、性别角色观、宗教信仰、慈善观念等,这些价值观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若非受到冲击或风险,很难改变。

社会福利态度存在群体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当同一群体受到时间、地域的影响发生态度变化时,需考虑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策水平及其他社会经济条件,此时从制度或文化的宏观因素来解释更具说服力。

(三)社会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的对应性

通过对比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态度,发

现其与福利体制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但相关性有强弱之分,即强相关下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的“三个世界”相对应,并强化个体差异;弱相关下社会福利态度受福利体制影响较小,不再有清晰的匹配模式。

不同国家或地区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存在巨大差异,这与福利体制模式大致相符:人们对平等、再分配和政府干预的支持在社会民主福利体制中表现最强,在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中较弱,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中最弱(Svallfors, 1997)。^[22]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以明显的平等主义脱颖而出,民众普遍享有社会福利,只有低度的贫困问题和不平等,因而受到民众的青睐。相比之下,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依赖社会保险,以精英方式将福利和贡献联系起来,呈现中度的贫困问题和不平等,民众支持度具有稳定性。自由主义福利体制通过选择性的福利政策来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因此存在高度的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产生颇多纷争(Sabbagh和Schmitt, 2016)。^[23]在不同的福利体制下,个人的社会福利态度通过联系宏观和微观的机制形成,借助民主政治制度反馈到宏观层面,福利体制模式进一步强化个体差异最终形成社会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之间的循环过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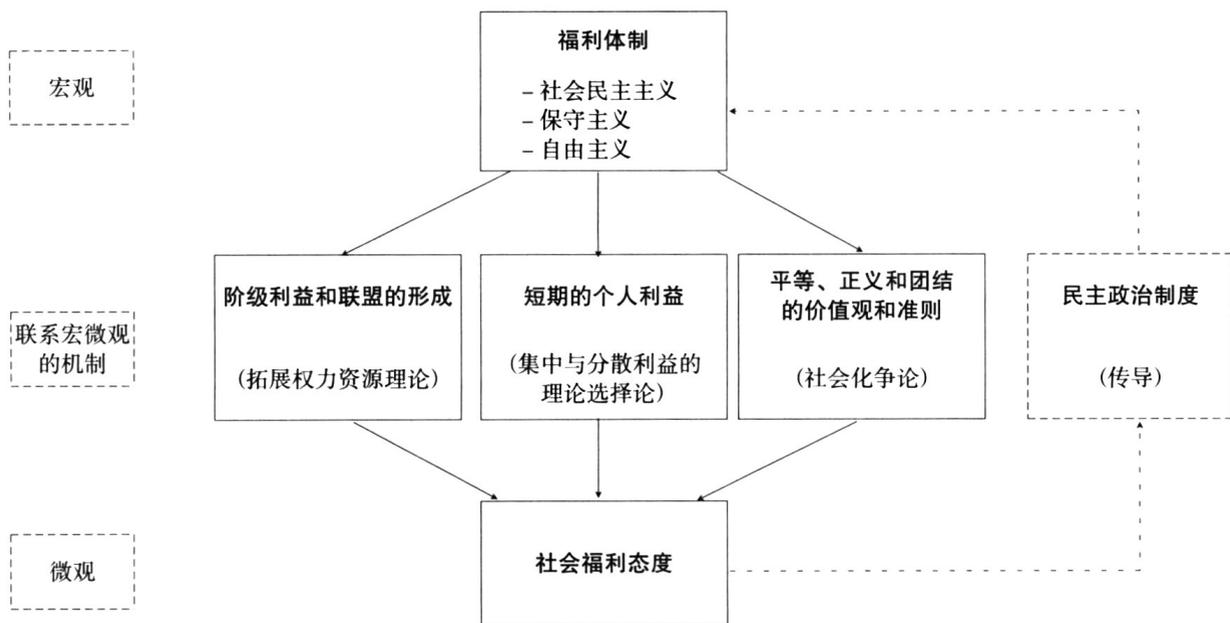


图1 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机制

资料来源:Larsen C.A..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Welfare Attitudes: How Welfare Regimes Influence Public Support[M].Aldershot: Ashgate, 2006: 14.

从福利应得性的角度来看,体制差异并不显著,呈现弱相关趋势。欧洲人拥有一种共同且基本的“值得”理念:无论何种福利体制下,都遵循“老年人—患者和残疾人—失业者—移民”的应得性顺序,越是贫穷、失业率低、对同胞和政府信任低的国家,这一次序越固化(Van Oorschot, 2006)。^[24]而福利沙文主义仅形成了两个阵营,自由和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下的民众比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的民众更不愿意向移民分配福利。总之,国家或地区之间社会福利态度的异同显示出可参照的模式,但因社会福利态度的复杂性,不能形成与福利体制完全相对应的“社会福利态度的三个世界”(Van Der Waal等, 2013)。^[25]

三、社会福利态度研究的变化

(一)制度视角向风险视角的转变

早期的社会福利态度研究解释了不同群体对福利国家或某一社会政策支持程度的差异,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选民对政治候选人改革方案的支持。自20世纪90年代起,艾斯平-安德森提出的三种福利体制模式划分,为探讨社会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的关系问题搭建了平台:正是不同福利体制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博弈,使得人们对政府在福利供给中扮演的角色持有不同观点。制度理论推动了社会福利态度的多样性发展,并在比较中找到差异形成的原因,与此同时带来的路径依赖却使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陷入僵局:一方面对于三种福利体制的类型学划分,学界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无法判断福利体制是依据现有制度进行的类型分化还是对不同制度的理论建构,也无法确定其他福利体制如东亚福利体制是否真的存在;另一方面福利体制与社会福利态度的动态关系如何衡量,现有的研究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松散匹配,但在福利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社会福利态度如何适应不同的福利结构,需要转变视角来理解。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冲击,产生家庭和性别角色上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及福利国家本身的变化。现阶段,福利国家面临的难题来自工作和家庭平衡难以协调、技能迅速消耗、社会保障覆盖面不足的“新风险”(彼得·泰勒-顾柏, 2010)。^[26]为此,欧洲国家普遍采取“紧缩政策”来缓

解支出压力,即减少政府提供的福利保障(Berrick和Gilbert, 2008)。^[27]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众对福利多元供给主体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福利私有化的实施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且其持续存在的内生动力是民众普遍接受这样的福利多元组合(Taylor-Gooby等, 2019)。^[28]显然,风险视角下的社会福利态度被赋予了更加多元的含义,具体表现在供给主体的拓展和福利内容的丰富两个方面。

在社会福利态度研究中,少数学者注意到市场不平等和再分配偏好之间的关系,也发现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市场提供的医疗或教育服务接受程度不同,未考虑家庭、社会组织等其他福利供给主体(Svallfors, 2007; Lindh, 2015)。^[29-30]在风险视角下,现有调查中鲜有涉及民众对于家庭承担福利供给责任的想法,政府仍可以通过家庭政策、购买社会服务等途径来帮助人们协调工作与家庭,因此可利用对家庭政策的支持程度来反观人们对家庭和政府角色配置上的偏好。以儿童保育政策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挪威政府提供的优质儿童保育服务提高了父母对日托中心的态度和期望,得到了几乎所有阶层的广泛支持(Ellingsæter和Gulbrandsen, 2007);反观德国,传统家庭观念及个体间差异的高度稳定造成了人们对公共托儿服务需求上的分歧(Goerres和Tepe, 2010)。^[31-32]从整个欧洲来看,母亲工作时长、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会特别支持托儿服务,以缓解他们的家庭生活压力。研究表明,政府更广泛地提供高质量托儿服务可以创造一个态度与需求间的良性循环,因为人们对公共儿童保育的支持是建立在客观现状和主观评价基础上的。但经过跨地域比较,微观因素影响就会被削弱,由此推测可能存在不同于“旧风险”的解释机制(Chung和Meuleman, 2017)。^[33]实际上,在对福利多元组合不同配置的看法上,民众不仅要回顾他们过去与政府机构的互动和生活经验,还要考虑何种供给主体能够最好地满足他们未来的养老、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出于经济利益希望政府买单,出于信任、情感关怀希望家庭承担,出于专业、质量角度则更依赖社会组织或市场。因此,人们期待的是各主体间相互合作,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Cammatt, 2015),从而有效

应对现代社会的风险。^[34]

除了福利供给主体的拓展,风险视角下的社会福利态度不再仅围绕养老、医疗、失业等政策,转为关注家庭政策、就业培训、教育等一系列社会投资项目的民众偏好,强调儿童的福利应得性。可见,此时的社会福利态度与社会投资这一转型理念密不可分,一方面作为福利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途径,社会投资可帮助应对现代社会产生的新的风险和结构,实现福利体系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维护知识经济基础,确保福利国家的财政和政治的可持续性(Vandenbroucke, 2011)。^[35]为此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社会投资,尤其是中产阶级,更期待社会投资带来的预期收益,而不是现有转移支付水平的简单叠加(Griezmann等, 2018)。^[36]与此同时,就业培训和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方案也增强了民众对劳动力市场项目的支持,有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预分配(Gallego和Marx, 2017)。^[37]在对福利国家的愿景中,人们对不同福利内容的态度包含社会福利、财政福利、职业福利等更广泛的领域探讨,兼顾多样的福利形式,不单是物质上的,还有社会服务等非物质的福利(Natali等, 2018)。^[38]总之,风险视角下的社会福利态度是随福利国家的发展而变化的(Rehm, 2016),并受主客观风险的影响表现更加多元、丰富。^[39]

(二)定性研究方法的兴起

长期以来,社会福利态度研究大部分是建立在标准化、封闭式问卷调查及随机抽样统计方法基础上的(Sundberg和Taylor-Gooby, 2013),如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国际社会调查计划(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ISSP)、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 ESS)等合作项目都包含了社会福利态度的相关问题,其中ESS数据库每轮调查都会有相应的欧洲福利态度调查报告。^[40]通过这些调查数据库,研究者可以建构多层次的社会福利态度指标体系,拓展福利态度的内涵与外延。而在测度方法的选择上,由最初的简单相加到分类加权、再到验证性因子分析,无不在试图提高社会福利态度测度的准确性。此外,量化研究可以帮助找到更多影响福利态度的因素,并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其中的相关性。目前,现有

研究在解读福利态度的含义及其影响因素上有较为系统的分析,也形成了一定共识。人们可以在制度类型学的比较视野下,理解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福利体制下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定量研究依赖于数据,得出的结论会受到数据可用性的严重制约。在现有的数据调查中,问题顺序、问题措辞、调查环境、提问模式或回应选择都会影响最后受访者的答案,原因在于人的态度主观性较强,存在前后不一致、不确定的甚至毫无立场的表达。当前的社会福利态度调查隐含了个人对福利国家有一套固定态度的前提,不受外界影响且存在思维定式,这恰好与人有矛盾心理的事实相违背,难以把握真实准确的观点。另外,在与理论结合解释政策与态度之间关系时,量化研究往往无法捕捉到个人选择背后的原因,此时需要定性方法来阐释深层次的形成机制与反馈路径。

近期的社会福利态度研究尝试了焦点小组座谈(focus group)和民主论坛(democratic forums)等定性方法来分析更深层次的社会福利态度,其中焦点小组座谈采取半结构式的调查与讨论,每一组参与人数4—8人,在人口特征上具有相似性,可分不同小组。焦点小组座谈的方法在搜集态度相关问题时具有一定的优势,成员能够就问卷中的选择进行讨论,进而发掘更多信息。在焦点小组座谈的研究中,福利态度不一致情况出现最多,接下来依次是不确定性、不表态和矛盾心理,态度的复杂性可见一斑(Goerres和Prinzen, 2012)。^[41]另一个民主论坛方法类似于学术论坛,为规模较大的群体讨论(30—40人),通常就关键议题展开为期超过一天的全体讨论和分组讨论,允许参与者提出疑问或者回应争论。这种方法没有设计结构化的问卷,尽可能开放式讨论,目的在于让参与人各抒己见(Taylor-Gooby和Leruth, 2018)。^[42]相较于问卷调查数据可以准确计算民众支持或不支持政府再分配的比例,民主论坛研究则能发掘选择背后的原因。同样是不支持政府再分配,在英国,民众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思想接受现有的不平等,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拒绝提高税收或实施更高福利的再分配计划。在德国,民众是不满于养老金、医疗、教育等具体福利政策引起的社会不平等,因为

这与把报酬和社会地位、贡献联系起来的社团主义理想完全不相容,所以反对进行重大的再分配改革。由此可见,社会福利态度研究中定性方法的转变能够揭示态度形成的原因,弥补量化研究的不足。当然,无论是焦点小组还是民主论坛,都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的缺陷,因此需要和量化方法结合使用,互补所短。

四、社会福利态度研究的趋势

纵观社会福利态度研究的发展过程,由于数据和资料的限制,初期研究者更多集中在寻找各自国民福利态度的内部差异及原因,此时社会福利态度的定义是模糊的、测度是单维的,讨论的核心是再分配偏好问题,多数研究为描述性的分析。在艾斯平-安德森提出三种福利体制之后,社会福利态度研究进入比较研究时期,重点探讨了福利体制和福利态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吸纳了不同学科的理论,测度变得不再单一。此时大多数研究是建构模型来阐释福利态度的形成机制,主流思想源于量化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在福利国家改革的背景下,社会福利态度研究借鉴风险理论,变得更加多元化,开始打破结构化调查数据的模式,通过民主论坛等定性方法来挖掘福利态度内在的形成机制和反馈机制,推动社会福利态度研究的发展。

当前,社会福利态度研究核心议题仍然是“社会福利态度是如何形成的”,虽然人们的社会福利态度受到微观因素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性,同时与福利体制模式有一定的对应性,但现实图景是多样的、复杂的。特别在逆全球化抬头的背景下,加之疫情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上造成的冲击,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如何借助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推动制度改革、缓解压力,不仅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也应该是学者长期探讨的重点。也只有厘清福利态度与社会政策的双向关系,从政策反馈中探寻“政策—态度—政策”的良性循环机制,才能积极应对更加严峻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未来。

可以预见的是,社会福利态度研究将在制度视角和风险视角的整合框架下发展,从福利供给和福利需求的双重角度揭示更多社会福利态度的不同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些国家或地区经历

了迅速而激烈的变革,社会投资理念深入人心,却依然面临人口老龄化、经济衰退、劳动力市场快速变化和移民冲突的困境,此时社会福利态度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并反馈于社会政策,取决于制度情境下的稳定性,也依赖于风险冲击带来的动态变化,需要基于不同的社会情景和个体特征予以考察。同时,借助定量和定性的混合方法的使用有助于我们探索福利态度与社会政策之间不断变化的复杂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对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还是亟待进一步挖掘的大“金矿”。

参考文献:

- [1]Meltzer A. H., Richard S. F..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89(5): 914-927.
- [2]Petersen M. B., Sznycer D., Cosmides L., Tooby J.. Who Deserves Help?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Social Emotions, and Public Opinion about Welfare[J]. *Political Psychology*, 2012, 33(3): 395-418.
- [3]Sachweh P.. Conditional Solidarity: Social Class, Experience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Welfare Attitudes in Europ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7, 139(1): 47-76.
- [4]Boberg-Fazlic N., Sharp P.. North and South: Long-run 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and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J]. *Cliometrica*, 2017, 12(2): 251-276.
- [5]Mau S., Wrobel S.. Justice and Public Opinion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06, 19(3): 379-393.
- [6]Merkley E., Owen A.. Back to the Future: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and the Estimation of Future Public Opin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19, 2(2): 1-20.
- [7]Roosma F., Gessen J., Van Oorschot W..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Welfare State Attitudes: European Cross-national Study[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 113(1): 238.
- [8]Petersen M. B., Slothuus R., Stubager R., Togeby L.. Deservingness versus Values in Public Opinion on Welfare: The Automaticity of the Deservingness Heuristic[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10, 50(1): 24-52.
- [9][瑞典]博·罗思坦. 正义的制度:全民福利国家的道德和

政治逻辑[M]. 靳继东, 丁浩,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56-164.

[10]Van Oorschot W.. Public Perceptions of the Economic, Moral, Social and Migration Consequences of the Welfare Stat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Welfare State Legitimacy[J].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10, 20(1): 19-31.

[11]Esping-Andersen G., Sarasa S.. The Generational Conflict Reconsidered[J].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02, 12(1): 5-21.

[12]Lober D.. Self-Interest and Solidarity in the “Silver Age” of the Welfare State: Older People’s Preferences for Youth-Oriented Social Spending in Times of Scarce Resources[D]. University of Konstanz, 2017: 112-148.

[13]Birbaum S., Ferrarini T., Nelson K., Palme J.. The Generational Welfare Contract: Justice, Institutions and Outcomes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7.

[14]Garand J. C., Xu P., Davis B. C.. Immigration Attitudes and Support for the Welfare State in the American Mass Public[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5, 61(1): 146-162.

[15]Reeskens T., Van Oorschot W.. Immigrants’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 Redistribution: An Exploration of Role of Government Preferences among Immigrants and Natives across 18 European Welfare States[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5, 31(4): 433-445.

[16]Lubbers M., Diehl C., Kuhn T., Larsen C. A.. Migrants’ Support for Welfare State Spending in Denmark,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J].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18, 52(4): 895-913.

[17]Kurowska A., Eisele O., Kiess J. M.. Welfare Attitudes and Expressions of(Trans)national Solidarity[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9, 4(63): 492-505.

[18]Hedegaard T. F., Bekhuis H.. Who Benefits? Perceptions of Which Migrant Groups Benefit the Most from the Welfare State among Ten Migrant Groups in the Netherlands, Denmark, and Germany[J]. *Acta Politica*, 2019, 38(1): 1-20.

[19]Rueda D., Stegmueller D.. Who Wants What? Redistribution Preferenc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20]Kumlin S., Svallfors S..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Political Articulation: Why Attitudinal Class Differences Vary across Coun-

tries[R]. LI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84, 2008.

[21]Kim Y. S., Yeo E.. “Koreans” Welfare Attitude: Focusing on the Inconsistency and Insignificance of Class Difference in Welfare Attitude[J]. *Economy and Society*, 2011, 91(3): 211-240.

[22]Svallfors S.. Worlds of Welfare and Attitudes to Redistribution a Comparison of Eight Western Nations[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13(3): 283-304.

[23]Sabbagh C., Schmitt M..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and Research*[M]. New York: Springer, 2016.

[24]Van Oorschot W.. Making the Difference in Social Europe: Deservingness Perceptions and Conditionality of Solidarity among Citizens of European Welfare States[J].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06, 16(1): 23-42.

[25]Van Der Waal J., De Koster W., Van Oorschot W..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hauvinism? How Welfare Regimes Affect Support for Distributing Welfare to Immigrants in Europe[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3, 15(2): 164-181.

[26][英]彼得·泰勒-顾柏. 新风险新福利: 欧洲福利国家的转变[M]. 马继森, 译,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0: 1-26.

[27]Berrick J. D., Gilbert N.. *Raising Children: Emerging Needs, Modern Risks, and Social Respons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8]Taylor-Gooby P., Heuer J-O., Chung H., Leruth B., Mau S.. Regimes, Social Risks and the Welfare Mix: Unpacking Attitudes to Pensions and Childcare in Germany and the UK through Deliberative Forums[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19: 1-19.

[29]Svallfors S..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Welfare State*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0]Lindh A.. Public Opinion against Markets? A Comparison of 17 Countries[J].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15, 49(7): 887-910.

[31]Ellingsæter A. L., Gulbrandsen L.. Closing the Childcare Gap: The Interaction of Childcare Provision and Mothers’ Agency in Norway[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07, 36(4): 649-669.

[32]Goerres A., Tepe M.. Age-based Self-interest,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lder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Public Childcare in 12 OECD Countrie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10, 49(6):

818-851.

[33]Chung H., Meuleman B.. European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s Public Childcare Provision: The Role of Current Provisions, Interests and Ideologies[J]. *European Societies*, 2017, 19(1): 49-68.

[34]Cammatt M., Lynch J., Bilev G.. The Influence of Private Health Care Financing on Citizen Trust in Government[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5, 13(4): 938-957.

[35]Vandenbroucke F., Hemerijck A., Palier B.. The EU Needs a Social Investment Pact[R]. OSE Opinion paper, 2011(5): 1-25.

[36]Griezmann J. L., Busemeyer M. R., Neimanns E.. Public Demand for Social Investment: New Supporting Coalitions for Welfare State Reform in Western Europe[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8, 25(6): 844-861.

[37]Gallego A., Marx P.. Multi-dimensional Preferences for Labour Market Reforms: A Conjoint Experiment[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7, 24(7): 1027-1047.

[38]Natali D., Keune M., Pavolini E., Seeleib-Kartin M.. Sixty Years after Titmuss: New Findings on Occupational Welfare in Europe[J].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18, 52(2): 435-448.

[39]Rehm P.. Risk Inequality and Welfare States: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s, Development, and Dynamic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40]Sundberg T., Taylor-Gooby P..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f Attitudes to Social Policy[J].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13, 47(4): 416-433.

[41]Goerres A., Prinzen K.. Can We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of Attitudes towards the Welfare Stat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2, 109(3): 515-534.

[42]Taylor-Gooby P., Leruth B.. Attitudes, Aspirations and Welfare: Social Policy Directions in Uncertain Time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The Dynamics and Trends of the Research on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

Shen Bingqing Lin Mingang

Abstract: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 are the barometer of a society, which is the frontier field of the research of social policy. By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es of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 since the 1990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main topics of the researches of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 as follows: the diversity of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 the group heterogeneity of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 and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 and welfare regimes. It also summarizes the two changes in the perspective and the method of the researches of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 i. e.,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urns to the risk perspective, making it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and richer; the qualitative approach is rising, which tries to explain the deeper reasons of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 In the future, to further expla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feedback path of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 and to grasp the dynamic changes between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 and policies will become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

Key words: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risk perspective